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

——从“士大夫”到“吏民”

凌文超

摘要: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关键词:秦汉魏晋;军功爵制;士大夫;文士;吏民;编户齐民秩制;役

自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发端,至秦汉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对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征,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基层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程度如何,以及由此导致的国与民关系的变迁,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仍有待大量的专门研究。

笔者注意到,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经历了从“士大夫”向“吏民”的转变,这一变迁与帝国政制的演变密切相关。然而,迄今未见将“士大夫”与编户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成果。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兼具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的士大夫^②更为常见,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相比之下,秦汉之际深深打上军功爵制烙印的“士大夫”却鲜有人关注^③。关于“吏民”的涵义,目前学界更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吏民”中的“吏”是编户齐民之下的特定群体“吏户”,其身份地位是低于编户齐民的依附民^④;另一种观点认为,“吏民”是编户齐民中拥有“中家以上”财产的“生活富裕”的特定群体,其身份地位高于一般编户民^⑤。黎虎则在批驳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吏民”即编户

作者简介:凌文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① 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2009年第1期。

②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③ 在《史记》、《汉书》中多有称将士为“士大夫”的记载,但学界只是稍有提及,并未对形成这一特殊用法的原因展开分析和论证,如余英时曾指出:“《史记》中的士大夫,主要是指武人(军官)而言,所以屡见于武将列传”,“‘士大夫’在汉初时主要系指武人,但愈往后便愈具有较广的社会涵义”,“谨慎一点说,至少在东汉政权建立之际,它已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五章(十三)“从士大夫名称之演变看东汉政权的社会背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8-242页。当然,也有学者将这些“士大夫”理解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全体官僚”,参见[日]葭森健介:《“士庶”考——针对唐宋变革前史的一个考察》,李济沧译,《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7-129页。

④ 高敏:《从〈嘉禾吏民田家莧〉中的“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蒋福亚:《〈嘉禾吏民田家莧〉中的诸吏》,《文史哲》2002年第1期;孟彦弘:《吴简所见的“子弟”与孙吴吏户制——兼论魏晋的以户为役之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2008年。

⑤ 刘敏:《秦汉时期“吏民”的一体性和等级特点》,《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齐民^①。学术界之所以对“吏民”有诸多不同的见解,是因为其研究主要围绕着同一历史时期吏民本身的特征展开分析,而较少从帝国政制的角度历时地探索“吏民”内涵的变迁以及推动“吏民”群体庶民化的原动力。有鉴于此,我们尝试着以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士大夫”“吏民”为例,探讨这一时期“爵—秩”体制的变迁对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影响。

一、从“士大夫”到公乘

“士大夫”一词,在传世文献中习见,其内涵丰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左传·昭公三十年》载:

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紼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礼]获数矣。^②

这里的“士大夫”为并列结构,指“士”与“大夫”,结合《新书·阶级》所云:

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③

士、大夫乃公、卿以下的爵位。故《荀子·强国》云:

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④

此“士大夫”与“官人”、“庶人”并列,已独立成词。“士大夫益爵”反映了“士大夫”一词脱胎于爵制的事实。

士、大夫本为周内爵公卿大夫士最低的两个爵级^⑤。“士大夫”在爵制群体内的地位相对低下,如《荀子·君道》云:

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⑥

《荀子·正论》云:

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⑦

所谓“下贤使之为士大夫”、“下为卿相士大夫”,此“士大夫”为周代统治集团的中下层,在世卿世禄的时代,他们不仅属于文化垄断者,也具有军事义务。在各国战争纷纭的时代,因“士大夫”统治地位相对低下,他们自然成了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和直接参战者,是行军作战的中坚力量。这在诸子著作中多有记述,如:

因舒军而围之,决晋阳之水以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匮,财力尽,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韩非子·十过》)^⑧

① 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文史哲》2007年第2期;《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关于“吏民”的界定问题——原“吏民”之五》,《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06—1507页。

③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0页。

④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5页。

⑤ “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页。

⑥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37—238页。

⑦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42页。

⑧ 王先谦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8页。

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荀子·王霸》)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荀子·议兵》)^①

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殒,此孤之大愿也。((《吕氏春秋·顺民》)

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吕氏春秋·似顺》)^②

后来,在兼并战争的过程中,为了获取优势,富国强兵成为各国最为迫切的追求。为此,各国纷纷推行变法改制,其中以秦商鞅变法构建的军国体制最为成功。商鞅变法以耕战为中心,爵制方面突出了军功对于晋爵的重要意义。秦军功爵制打破了以宗法身份获爵的传统,爵位获取的依据不再是文化的垄断和与生俱来相应的军事义务,而是以功劳作为拜爵的基本依据。秦军功爵实现了对先秦世卿世禄的革命。即使秦参照了周内爵制将军功二十等爵划分为“侯、卿、大夫、士”四个爵层,秦军功爵制也与周爵制的本质迥异,最突出的反映是,其文化特质已黯然失色。

对于秦军功爵制,《商君书·境内》云:

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裹。(故爵簪裹),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故爵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卿。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爵)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为大(左)庶长。故(爵)大(左)庶长,(就为右庶长。故爵右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爵左更,就为右更。故爵右更,就为小良造。故爵小良造),就为大良造。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罢)。其县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级)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入)兵官之吏。^③

该记载重点突出了爵“大夫”与“爵吏”、“赐虏”、“五大夫”与“赐税邑”的关系,秦军功爵据此大致可分为三层:大夫以下,大夫至五大夫,五大夫以上^④。从中约略可见周内爵卿、大夫、士的身影。

又曹魏刘劭《爵制》云:

秦依古制,其在军赐爵为等级,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义也。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子男之义也。秦都山西,以关内为王畿,故曰关内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然则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异其名,亦所以殊军国也。

古者以车战,兵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车,大夫在左,御者处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虽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裹,御驷马者。要裹,古之名马也。驾驷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裹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车左者也。六爵为官大夫,七爵为公大夫,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皆军吏也。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赏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虽非临战,得公卒车,故曰公乘也。

①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29、278页。

②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3、659页。

③ 括号中为校订内容,引文校订具体情形,请参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119页;[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之《〈商君书·境内篇〉解读》,钱杭、杨晓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6页。

④ 守屋美都雄指出:由于当时秦本身还是诸侯,秦公的大臣们即便已可入卿大夫士之列,也不可能升至与秦公同等地位的“侯”一级。因此,从最初制定爵制开始,商鞅就没有考虑过设立“列侯”的爵位,见氏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27—28页。

十爵为左庶长,十一爵为右庶长,十二爵为左更,十三爵为中更,十四爵为右更,十五爵为少上造,十六爵为大上造,十七爵为驷车庶长,十八爵为大庶长,十九爵为关内侯,二十爵为列侯。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大庶长即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也。^①

刘劭将公士、上造、簪裹、不更划为士爵层,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划为大夫爵层,五大夫以上还有卿、侯爵层。这很显然是受周内爵制的影响进行的二次分等。秦军功爵制分为侯、卿、大夫、士四个层次,还得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相关记载的证实^②。

对读《商君书·境内》与刘劭《爵制》关于秦爵制的记载,《商君书·境内》前后所谓“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罢)”,“尽赏行间之吏”与“致士大夫劳爵”义同,“吏”与“士大夫”所指群体一致。而刘劭所云:“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从一爵公士至九爵五大夫,皆军吏也^③。也是将士、大夫级爵群体视作“军吏”。《商君书·境内》和刘劭《爵制》所述的“军吏”、“士大夫”,皆指凭借功劳获取九爵以下的军吏群体。这与周代兼具文武职能的“士大夫”具有不同的特色。

“士大夫”这类用法,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中也有记录: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④

整理者注:“官士大夫,指秦爵第五级大夫和第六级官大夫。”^⑤此注解忽略了“士”的含义,显然是不准确的。“官士大夫”之“官”,其含义当为官方、官府。由于秦代乡里编户民大多也拥有士、大夫级爵(详后),这些人平时显然无法享用传食,除非受到官方的派遣。因此,“官士大夫”旨在强调只有为官府任职的“士大夫”才可以“爵食之”,只拥有士、大夫级爵的普通民众则没有这项权益。此“士大夫”当然也是指士级爵和大夫级爵,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裹、不更爵和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爵。

秦汉之际,士、大夫级爵群体不仅是秦灭六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刘邦立汉的基础。司马迁《史记》云:“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⑥汉初布衣将相之局^⑦,此“士大夫”具体说来是指以士、大夫级爵为中坚的军功阶层^⑧,故《史记·张丞相列传》云:“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⑨《汉书·任敖传》云:“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⑩

①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五》注引刘劭《爵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31—3632页。

② 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收入《军功爵制考论》,第233—241页;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收入氏著《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6—192页。

③ 刘劭既云“九爵为五大夫,皆军吏也”,又云“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贵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之所以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刘劭所处的汉魏之际,二十等爵四分层早已瓦解,五大夫为官爵,而公乘民爵之最高爵级,刘劭称“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明显受到当时赐民爵的影响。

④ 秦代传食依“爵食之”,以官吏的爵级为本位。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规定,使非吏,食从者,皆以爵比秩食之,爵位参照秩级的标准执行(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0页)。那么,秦代是否也同汉代一样,存在以官比爵呢?由于秦代爵、秩疏离并不明显,有官必有爵应是普遍现象。秦汉之际传食依据由爵而秩,反映了官僚结构从爵本位到官本位转变的趋势。相关研究可参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9页。

⑦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37页。

⑧ 关于汉初军功阶层的具體情形,可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⑨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2681页。

⑩ 班固:《汉书》卷四十二《任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98页。

军功爵秩下,“士大夫”与“军吏”所指群体一致。受此影响,西汉时期的“士大夫”多泛指将士,这在《史记》、《汉书》中多有其例,如: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

《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

《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輜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

《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

《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当今之计,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飧士大夫。”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汉书》卷六十七《胡建传》:“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甚至在魏晋之际的史籍中仍有孑遗,如: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今积帑藏之财而慊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

秦汉之际,士卒主要来源于编户民,他们是军功爵授予的主要对象。由于军功爵的四分层在爵层之间设置限止,跨越爵层必须满足相应“官职”和“军功”的要求,绝大多数的士卒仅仅依靠斩首之功难以获取高爵^①,他们只是士、大夫低级爵位的拥有者。这些士卒从编户民中来,又返归于编户民中。在这一过程中,秦汉帝国通过士、大夫低级爵位的拜授,确定基层民众个人的身份,并将爵位写入编户民的户籍之中。爵位是实现帝国支配编户民的重要手段。这反映在秦汉之际户籍类材料中,即编户民常见拥有士、大夫级爵,而未见卿级以上的高爵^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③五大夫应是秦汉之际编户民的最高爵。目前所见秦汉户籍类材料中,受乡里管辖的编户民爵位最高至五大夫,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黥妾爰书》“丞某告某乡主: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甲诣乙妾丙”^④。而里耶秦简户籍类材料中,编户民爵位多为五大夫以下的爵级,如:

1. □□二户

夫=(大夫)一户

夫=(大夫)寡三户

① 参见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杜正胜认为,秦爵以军功作为全民身分阶级准绳的根本精神却是崭新的创制,前四级尤关乎编户齐民,在平民中设定身份,更为前古所未有。在秦军功爵制下,绝大多数的有爵者都集中在第一级至第四级之间,他们构成秦国社会的中坚基础。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333、359页。士卒爵位主要集中在士级爵,应是秦军功爵创制之初的情形。随着因功拜爵的频繁,士卒拥有大夫级爵当日益增多,秦汉之际的户籍类材料中,即常见大夫级爵。

③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1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5页。

不更一户

小上造三户

小公士一户(第一栏)

士五(伍)七户□

司寇一户□

小男子□□

大女子□□

·凡廿五□(第二栏)(8-19)^①

2. 今见一邑二里夫=(大夫)七户、夫=(大夫)寡二户、夫=(大夫)子三户、不更五户□(8-1236)

3. 南里户人官夫=(大夫)布□

口数六人□

大男子一人□

大女子一人□

小男子三人□(9-2299)^②

秦汉之际编户民不仅有大夫级爵如五大夫、官大夫、大夫,也有士级爵不更、(小)上造、(小)公士^③,还有无爵者士伍、司寇等。秦汉初年,士伍具备进入爵制序列的最低资格,且延续了二十等爵的级差,而司寇虽然是受限制的役徒,其身份对军功拜爵有所限制,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规定,司寇子傅籍为士伍,从而具备了进入爵制序列的基本条件,可以说,无爵者士伍、司寇等仍是从属于爵制序列的^④。这些士、大夫级爵乃至从属于爵制的士伍、司寇等,具有体现帝国成员和承担赋役义务的意义,爵位的授赐贬夺是帝国控制编户民、塑造乡里社会的重要手段。

秦汉之际,帝国以功劳为依据,授予士卒、小吏士、大夫等低级爵位^⑤,当这些“士大夫”返归乡里,他们所获取的爵级,以及附丽于爵位上的权益大小、赋役的轻重,不仅决定了他们自己的身份高下,一旦成为男性户主,其家户的权益也与此紧密相连,甚至死后还影响其寡妻孤子的身份地位,如简1、2以爵计户中,就出现有“大夫寡”、“小上造”之类家户。可以说,这一时期,从军功而来的“士大夫”返归编户民中,进而形成了编户民乡里社会等级秩序^⑥。正如《史记·商君列传》所云:“明尊卑爵秩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编号8-19中19为简号,8为层号,下同。

② 张春龙:《里耶秦简中户籍和人口管理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194页。

③ “小上造”、“小公士”即“小爵”,小爵乃小吏傅之爵位。参见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之一《小吏傅》,《简帛》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5-477页。

④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辨析》,《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8-159页。

⑤ 宫崎市定认为,从春秋末到战国初,庶民得到解放,这主要得益于军制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庶民可以参军,所以必须给予他们自由,作为报偿。于是,庶民也成为士,而且还可以根据功绩提升至大夫。当然,后者十分罕见,庶民实际只能上升到士。因此,实际上过去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或者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区别,依然如故。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38页。至秦汉之际,随着战事频繁,因军功获爵群体扩张,从出土文献看,此时编户民拥有大夫级爵十分常见。秦以耕战立国,废分封而立郡县,乃“天地一大变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第36页)。军功爵制下,个人凭借功劳可以获得官爵,甚至高级官爵,这打破了先秦的世卿世禄制。而魏晋以后庶民的仕进受到诸多限制,还有身份清浊、贵贱之别。因此,秦军功爵层上、下之分,既不同于前期的贵族、平民之别,也不同于后来的士、庶之隔。

⑥ 西岛定生认为,二十等爵制“以皇帝为中心,把包括下至居住在里的庶民在内的人民,都组织到一元化秩序中去,这也就是说,这个爵制具有作为国家秩序的性格”。见[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0页。

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①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即按爵级有差别的名田宅。另外,在傅籍、皖老、免老、禀鬻米月一石、受杖、赐物等方方面面,其权益随爵级而递增^②。爵位有时还可以抵罪,享受免于刑罚的权利,如《商君书·境内》云:“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③由此可见“士大夫”爵级是构造乡里社会秩序的维度。

然而,东汉三国以后,“士大夫”的文士色彩渐浓,如《三国志·蜀书·张飞传》云:“(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④而其带有军功爵制深深烙印的涵义,逐渐湮没无闻。两汉已降爵制的发展变迁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汉帝国建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官僚和吏民,适应形势的变化,将军功拜爵转变为赐爵制,并将二十等爵制以秩六百石、五大夫为界,划分为官、民爵。这时,原“士大夫”群体,公乘爵以下属于民爵,五大夫爵则属于官爵,编户民不再是五大夫爵授予的对象。在西汉中期以后西北边塞和内地简牍中,普通士卒和平民皆无五大夫爵^⑤。原“士大夫”阶层从而分化了。“士大夫”所指对象已发生变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士大夫”爵制涵义逐渐消逝。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激发“士大夫”文化特色的过程中,周秦两汉“子大夫”的沿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子大夫”在诸子著作中是对贤士的尊称,如:

(齐桓)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

(《管子·小匡》)^⑥

(齐景)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凡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晏子春秋·外篇》)^⑦

国君尊称管仲、晏子为“子大夫”。在上述文例中,“子大夫”与“大夫”、“夫子”皆为敬称,多指有道德、学识、声望、职位的人。在秦汉史籍中,“子大夫”亦很常见,如: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史记·滑稽列传》)^⑧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

② 参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户律》、《傅律》、《赐律》等,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8-50、52、57-58页。

③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20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张飞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4页。

⑤ 如张家山汉简《秦赋书》记录:“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前文云:“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刻(劾)狱史平舍匿无数大男子种一月。”可知,对狱史平的诉讼由安陆县提出,这应与他“属安陆相”有关。张家山汉简《秦赋书》中还有类似的记录:“七年八月己未江陵忠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恢居郾邑建成里,属南郡守。”(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97、98页)恢爵左庶长,比五大夫高一级。恢虽然居处在郾邑建成里,为醴阳县令,但他似乎并不归县邑管理,对他的司法提审由“江陵忠”作出,由南郡守审理,是他“属南郡守”的缘故。这类拥有较高爵位且在官府任职者,对他们的管理被纳入相关的行政架构之下,这与一般的乡里管理模式是不同的。同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了“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这应是汉初以前的情形。分赐官、民爵以后,五大夫从属于官爵,不再授予编户民。虽然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张家山汉简《秦赋书》中记载了某里五大夫,但是,爵五大夫在秦汉之际是高爵,如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诏书云:“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54-55页)。七级爵公大夫已是高爵,能与令丞抗礼,更何况九级爵五大夫!对他们的管理与一般乡里编伍的平民可能并不相同。秦汉之际,基层编户民拥有五大夫爵想必极少。里耶秦简户籍类简牍中,目前所见编户民最高爵级仅至六级爵官大夫。

⑥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6页。

⑦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1-102、517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06页。

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①

诏曰:“朕思遵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懣,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后汉书·章帝纪)》^②

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盐铁论·国疾)》^③

在这些文例中,“子大夫”的特点是“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明于古今王事之体”;“论京师之日久,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汉代的“子大夫”,不但具备优良的儒学素养,而且积极参与政事,还拥有官职,这与汉代已降的“士大夫”一样,兼具文人、官僚两种角色。至迟在东汉时期,“子大夫”“士大夫”并行,且所指代对象一致。

“子大夫”与“士大夫”的涵义为何会具有一致性呢?我们可以从历代的注解中一探究竟。《诗·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毛亨传:“畏子大夫之政,终不敢。”郑玄笺:“子者,称所尊敬之辞。”^④在西汉毛亨看来,“子”与“子大夫”义同。《公羊传·宣公六年》:“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何休注:“古者,士大夫通曰子。”^⑤东汉何休认为,“士大夫”古代通称为“子”。根据毛亨、何休的注解,“子”、“士大夫”、“子大夫”义同,皆为尊称。因此,对于《汉书》中出现的“子大夫”,服虔曰:“子,男子之美号也。”^⑥颜师古注:“子者,人之嘉称。大夫,举官称也。志在优贤,故谓之子大夫也。”^⑦

又《文选·汉武帝〈贤良诏〉》:“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李善注:“《国语》:‘越王句践曰:苟闻子大夫之言。’贾逵曰:‘亲而近,故曰子大夫也。’”吕向注:“子大夫,谓贤良人也,此天子之敬辞。”《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朕获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征,风雨玉烛,克明之旨弗远,钦若之义复还,于子大夫何如哉?”刘良注:“子大夫,秀才也。”^⑧《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君子六千人。”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犹吴所谓‘贤良’,齐所谓‘士’也。”^⑨在贾逵、韦昭看来,君王身边有志行者,称之为“子大夫”、“君子”、“贤良”、“士”。而《礼记·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绀衣以裼之。”郑玄注:“君子,大夫士也。”^⑩“大夫士”亦可称为“君子”,而“士大夫”一词原本源于周爵“公卿大夫士”。总的看来,“子”、“子大夫”、“士大夫”、“君子”、“士”、“贤良”在东汉以后,所指代的群体一致,皆指“士人”阶层。

东汉以后,“士大夫”与“子大夫”在一段时期内同义并行。然而,魏晋以后,史籍中的“士大夫”越来越多,“子大夫”却越来越少^⑪,以至《宋史》以后,正史中“子大夫”未再出现,完全为“士大夫”所取代。“士大夫”为何能取代“子大夫”呢?这与社会阶层的发展以及语言中词义系统内部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两汉已降,士人阶层得到极大的发展,且在官僚政治、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极大

①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1页。

② 范曄:《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40页。

③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33页。

④ 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3页。

⑤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

⑥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59页;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496页。

⑦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2页。

⑧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677页。

⑨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一《句践世家》,第1744—1745页。

⑩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05页。

⑪ 《汉书》以后,“子大夫”仅出现于范曄:《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40页;陈寿:《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255页;《三国志》卷八《魏书·王烈传》,第356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4、1447页;《晋书》卷五十五《夏侯湛传》,第1492页,同卷《张协传》,第1523页;魏收:《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引文,第1387页;李延寿:《北史》卷四十《李彪传》,第1457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刘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65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页;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58页。

的作用。士人不但是官员的主要来源,而且在“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使士人阶层成为中华帝国最为特殊的一个阶层^①。这一阶层需要一个适合他们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受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制约,同一共时平面中意义相同的两个词语之间,往往存在着选择和竞争,其中一个词语作为优胜者得以传承,而另外的词语则走向消亡。由于“士大夫”一词中“士”的语素义凸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士人”,而“子大夫”表示“士人”的含义则稍嫌曲折,于是,“士大夫”取代“子大夫”成为“士人”、“文人官僚”含义的常用词。

因二十等爵制机能的松弛,由民爵塑造的乡里等级秩序也逐渐解体。特别是,晁错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②,提出入粟拜爵之策,以爵换取民众的财富;帝国时而又因灾害而允许民爵买卖,如汉文帝后六年(前158),“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③,致使出现富者必有高爵的趋势,民间经济秩序借此极大地影响着帝国基层政治秩序。随着赐爵的频繁,民爵日益轻滥,民爵所带有的权益也渐趋虚无,民爵等级也不再代表田宅多少、徭役轻重、权益大小,吏民拥有公乘爵也越来越普遍,以致“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空设文书而无用也”^④,八级民爵的等级意义也随之消亡。

至迟在孙吴时期,公乘成了唯一被实际使用的民爵。在嘉禾四年(235)小武陵乡征赋户籍簿中,虽然户人简整齐地记录了公乘爵,但户口简大多未记公乘爵,如:

4. 吉阳里户人公乘区张年廿八算一给州吏(壹·10367·116/14)^⑤

张父□年七十五(壹·10349·94/14)

5. 高迁里户人公乘张乔年卅算一给县吏(壹·10412·161/14)

乔兄□年廿八算一刑左足(壹·10400·149/14)

6. 高迁里户人公乘松柴年卅四算一给县吏(壹·10080/14)

柴叔父负年廿八算一(壹·10079/14)

而在嘉禾六年(237)广成乡派役户籍簿中,户人简公乘爵未再被严格、整齐的记录,而有的户口简则记录有公乘爵^⑥,如:

7. 郡卒潘囊年廿三(貳·1708·70/16)

囊妻大女初年廿六 囊父公乘寻年六十一苦虐(?)病(貳·1696·57/16)

寻妻大女司年卅四踵(肿)右足 囊男弟公乘祀年十一(貳·1694·55/16)

8. 民男子杨秃年六十 秃妻大女姑年卅九算一(貳·1795·204/16)

秃子仕伍白年四岁 秃弟公乘[期]年五十腹心病(貳·1799·208/16)

由此可见,孙吴时期,即使是唯一被使用的公乘爵,其记与不记,影响都不大。这时,爵位所具有的身份等级意义已丧失殆尽,编户民的制度身份也因之而等齐化。“士大夫”所具有的爵制等级的涵义也随之消亡,在魏晋以后的史书中,再也见不到这类用法了。

①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4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32页。

④ 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王粲《爵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916页。

⑤ 本文所列走马楼吴简号如“壹·1037·116/14”依次指卷次、出版号、揭剥位置示意图编号和盆号。下同,不另出注。见走马楼简牍整理小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07年。

⑥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辨析》、《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吴简研究》第3辑,第9—64、153—166页。

二、从“吏民”到庶民

魏晋时期,爵制意义上的“士大夫”逐渐不被使用,这与秦汉以来爵制尤其是民爵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帝国不再通过爵制实现对编户民的人身控制时,势必会转换另外一种方式贯彻其权力、意志,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分析“吏民”内涵的衍变,有助于探讨汉晋之际帝国塑造基层社会的新手段和由此导致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

“吏民”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大量使用,内涵丰富。秦汉魏晋时期,随着制度的变革,社会的变迁,吏民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所指群体的范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所属阶层也在不断下移。下面我们尝试对秦汉魏晋文献中出现的“吏民”进行梳理和归纳,探索“吏民”涵义衍化的过程,动态地看待“吏民”涵义的变迁。

秦代,“吏民”为并列结构,指官吏和庶民。如《商君书·定分》云:

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①。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吏)遇民不修(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②

又如睡虎地秦简《语书》云:

廿年(前227)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嗇夫:……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毆(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佚)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毆(也),而长邪避(僻)淫失(佚)之民,甚害于邦,不利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距)于罪。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毆(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③

文中多次提到的“吏民”,其“吏”显然是指官吏,而“民”则指平民、黔首。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云:“凡为吏之道,必审智(知)民能,善度民力”,“吏有五失:一曰见民梟(倨)敖(傲),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伤指”^④。这里的“吏”、“民”为治与被治的关系。秦代官、吏分化不明显,“吏”更多地用来指官员,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⑤“官”则多指国家、官府、任所。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云:“吏有五失:三曰居官善取,五曰安家室忘官府。”^⑥而“民”在秦末并不常用,主要是因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更名民曰黔首”^⑦,这一诏令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如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相关内容为“审智(知)民能,

① 秦汉之际,“官”多指具有相关行政职能的机构或组织。这里“法官”当指管理法令的机构。《商君书·定分》前文云:“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又云:“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比)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禁室)之法令,学并问所谓。”(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41—144页)“诸官吏”即诸官之吏,“诸官吏及民”即吏民,“主法令之吏”即法官之主管者。“法官”乃中央至诸侯郡县皆有设置的管理法令的机构。“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意即“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之主管者)”,以“法官”指代“主法令之令”,这类以组织、机构名称省称职名的现象,在秦汉时期的文书和器物铭文中常见。参见李学勤:《〈奏谏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61—63页。

②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44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7、169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9页。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9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善度黔首力”，“一曰视黔首渠（倨）骛（傲）”，“三曰举事不当则黔首骛指”^①，其中，只有“审智（知）民能”之“民”未改为“黔首”。受“民”更名的影响，秦末文献中的“吏民”并不多见。

至两汉时期，“吏民”指官吏和庶民的法，在诏书中屡次出现^②，如：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三年七月辛亥，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诬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十二年春二月，诏曰：“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

《汉书》卷十《成帝纪》：永始二年二月癸未，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这些“吏民”之“吏”皆指有官、爵者，而“民”则指平民。一般说来，秦汉时期，皇帝的臣民可统称为“吏民”。不过，这一用法在东汉以后很少见，因为“吏民”所指代群体的范围有不断缩小的趋势，高级官吏逐渐不再涵括在“吏民”之中，如：

《汉书》卷五《景帝纪》：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

《汉书》卷七《昭帝纪》：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始建国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

在上述用例中，“吏民”多指王公、卿大夫、吏二千石以下，秩级相对较低的官吏和庶民，“吏民”未涵括“王公、卿大夫、吏二千石”之类的高级官僚^③。而在赐民爵、牛酒时，诏令中的“吏民”则多泛指一般平民，如：

《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夏四月，诏曰：“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五年夏四月，诏曰：“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汉书》卷十《成帝纪》：建始元年二月，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二千石黄金，宗室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钱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户牛酒。

《汉书》卷十《成帝纪》：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

《汉书》卷十《成帝纪》：鸿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

《汉书》卷十《成帝纪》：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赐

①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87—189页。

②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摘录的诏书内容，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当时语言、词汇和文字运用的基本情况。

③ 宫崎市定认为：汉代的俸秩分为十几个大等，大的区分可以归纳为二千石以上、六百石以上、二百石以上和百石以下四个级别，它大致与儒家所说的公卿大夫、上士、下士和庶民四个阶级相对应。[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45页。

云阳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

所谓“赐天下吏民爵”,即赐民爵,为公乘以下爵级,按级数赐予,其赐予的“吏民”群体是固定的,为秩六百石以下的吏员和庶民^①。因此,在赐民爵的过程中,“吏民”原本涵括的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也逐渐被剥离开来。

因汉代吏民爵的赐予普遍而频繁,并日益轻滥,受此影响,“吏民”阶层不断低落,尤其是那些秩级更低,终日供长吏差遣的少吏,其地位与一般编户民相仿。这反映在汉魏文献中,“吏民”又多泛指郡、县长吏治下的地方小吏和平民,且有“今之长吏,皆君吏民”^②之说。兹略举几例如下:

《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或欺罔,乃服从其教化。

《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奂纪》:咸熙元年九月辛未,诏曰:“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邓)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

《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京房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

《后汉书》卷七十六《刘宠传》: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

《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甘露二年夏四月癸卯,诏曰:“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叛,长郑熙为贼所杀。”

在汉晋出土文献中,常见乡里“吏民”的记录,如:

9. 书到,二千石遣毋害都吏,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嗇夫吏正父老,杂验问乡里吏民。(肩水金关汉简 73EJT1:1-2)^③

10. 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县丞(承)书从事……当用者,明白扁乡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知之,具上壹功^④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别之,如诏书。(额济纳汉简 2000ES9SF4:1)

11. 广成乡谨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走马楼吴简貳·1798·207/16)

广成里谨列领任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貳·1797·206/16)

凡广成乡领吏民□□五十户口食二千三百一十人(貳·2529/16)

12. 定丁男一千九百八十九军将州郡县吏民士卒家丁(郴州晋简 1-35)^⑤

这些郡县长吏治下的吏民,在分赐官、民爵的体制下,他们难以跨越秩六百石与五大夫的鸿沟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地方官府六百石以下吏员又有“长吏”“少吏”之分,少吏为官府服务,承担相应的职

① 关于汉代二十等爵制的结构,以及分赐官、吏民爵的具体情形,参见[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51-308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第297页。“长吏”指官府机构之长官。相关研究可参见邹水杰:《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张欣:《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④ 邹文玲认为“壹功”当作“壹切”解,参见其作《额济纳始建国二年诏书册“壹功”试解》,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37-139页。额济纳汉简释文亦参见该书。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99页。

役。随着官府事务的繁复,还征调编户民任“给吏”,给事某机构^①。少吏职事与给吏相同,只是拥有编制而已。他们都来源于编户民,又返归于编户民中,身份地位并无多少差异。由此看来,郡县长吏治下的“吏民”其实就是编户民,是帝国赋役的主要承担者,这成为魏晋以后“吏民”的一般用法,而广泛地见于史籍中。

三、“爵—秩体制”与“士大夫”、“吏民”

秦汉之际,受军功爵制的影响,“士大夫”主要指来源于编户民的士、大夫级爵的群体;东汉以后,士大夫的文士色彩日益彰显。而“吏民”在秦汉之际指官吏和庶民;至汉魏之际,其涵义已缩小为长吏治下编户民。秦汉之际的“士大夫”和汉魏之际的“吏民”,皆在编户民中占主体地位,主要承担帝国的赋役义务,是政权统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两者所指代的对象具有共同性。编户民角色从“士大夫”到“吏民”,以及两者涵义在秦汉魏晋时期的变迁,体现了编户民在前后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从表面来看,这反映了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化,其实质则是帝国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控制编户民手段的结果。

秦汉“爵—秩体制”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吏民”涵义的变化^②。秦军功爵设置士、大夫、卿等爵层,在爵层之间规定相应的官职和“盈论”晋升标准。如晋升卿级爵不仅需要官职为“将”,还要“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或“野战斩首二千”,才能“盈论”拜爵。士卒一般很难有机会获至卿级爵,他们大都只是士、大夫相对低级爵位的拥有者。秦军功爵层的设置,和士卒一般只有士、大夫低级爵的事实,促使具有士、大夫级爵涵义的“士大夫”一词出现。因这些士卒来源于编户民,又返于编户民之中,其军功爵与个人乃至家户的权益紧密相连,进而影响着乡里日常秩序。一般说来,秦军功爵下的“士大夫”其实就是编户民,秦户籍类材料中,编户民也仅见士、大夫级低级爵。

秦军功爵制虽然在爵层之间设置限止,但是,大量军功爵的拜赐导致了庞大冗杂军功爵群体的形成,且不断扩张,冲击着军功爵的分层限止,低级爵层逐步向上侵蚀高级爵层,致使各爵层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士、大夫爵层之间,不再难以跨越。在爵层分化的同时,高、低爵的新剖分开始显现。汉代二十等爵制继承和发展了秦军功爵,特别是汉帝国建立后,由乱世转为治世,激励士气的军功爵逐渐转变为帝国管理官僚和吏民的赐爵制。汉初频繁的赐爵,推动了高爵的限止爵级的不断上移,由公大夫而公乘,而五大夫,二十等爵事实上剖分为高、低爵。汉帝国并不希望高爵一味地退让,为了维护二十等爵制,统治者利用大夫爵层业已分化的事实,将不断低落的“大夫级爵”(五大夫除外)连同士级爵都归为低爵,并将爵级顺从于秩级,利用相对稳定的秩级六百石与五大夫结合,来确定官、民爵的分界。民爵自第一级公士至第八级公乘赐予一般庶民和下级官吏;官爵第九级五大夫以上,秩六百石的官吏始得授予。这时,原本属于“士大夫”群体的五大夫,转而归属于官僚集团,“五大夫”的官爵化,使编户民不再拥有五大夫爵,在西汉中期以后的乡里简牍户籍中,再也未见五大夫的记录了,原“士大夫”阶层也就因之而分化了。

二十等爵制分赐官、民爵,导致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即五大夫爵以上的官僚集团,公乘爵以下的吏民群体。而带有爵制意义的“士大夫”一词,显然已不再适合由官、民爵剖分带来的阶层分化,其“士、大夫级爵”的涵义逐渐消退。有趣的是,这一变动为“士大夫”官僚、文人二重角色日益彰显提

^① 关于汉魏时期的“给事”与“给吏”,参见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给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影响“士大夫”、“吏民”涵义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独尊儒术的推行、赋役制度的变革、社会文化的发展等,但“爵—秩体制”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而重要,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开展研究。“爵—秩体制”的概念及其形成和发展,参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3—87页。

供了方便。士、大夫本为周内爵^①，先秦卿士大夫垄断了文化，世卿世禄，四民中，士为“学以居位”的知识阶层^②。随着汉代官僚制的发展，以及对儒学的尊崇，以“士大夫”指代官僚、文人在史籍中涌现，“士大夫”与知识官僚集团的结合日益明显。而原来使用频繁士、大夫级爵意义上的“士大夫”反而随着民爵功能的消褪逐渐湮没无闻。

官、民爵之分也影响了“吏民”涵义的变化。官、民爵之分不仅有助于汉帝国分别管理官僚和吏民，也便于差别化管理官吏集团，促使了官、吏逐渐分化。官、民爵之分与秦汉之际秩制的发展关系密切。秦汉时期，随着官、爵的日益疏离，秩级逐步取代爵级成为官阶的基本尺度^③。在秦汉之际秩制的发展过程中，秩六百石已逐渐成为官僚系统较为稳定的分界，官、民爵之分正是得益于这一分界。可以说，秩六百石是“爵—秩体制”下区分官、民爵最为重要的基准。汉帝国分赐官、吏民爵，实际上昭示着秩六百石以上者为“官”，以下则为“吏”，官、吏分途开始显现^④。至汉景帝下诏：“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⑤官、吏的分界正式确定下来^⑥。为了稳定这一分界，后来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除五百石秩^⑦，从而更加拉大了官僚系统剖分的界限。以六百石与五大夫为分界的官、民爵之分，不仅是官、吏分途的开始^⑧，也影响着“吏民”阶层的下移。在赐吏民爵的过程中，“吏民”的群体是固定的，即秩六百石以下的吏员和庶民，“吏民”已不再涵括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

同时，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吏群体也在逐渐分化，出现“长吏”、“少吏”之别。在此，先值得说明的是，秦汉史籍中常见的“长吏”与“少吏”、“大吏”与“小吏”，原本是相对的概念，体现了吏员的等级上、下^⑨，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长吏以县官事詈少吏□者，亦得毋用此律。”^⑩《汉书·高帝纪下》诏曰：“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⑪《史记·酷吏列传》云：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⑫。不过，随着爵—秩制度的改革，“长吏”、“少吏”等逐渐成为制度上具有特定内涵的专用词。如“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很明显受到官、民爵之分的影响，此“长吏”即我们一般理解的“官”。又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

① “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见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第80页；“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见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16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17—1118页。

③ 参见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由“比秩”论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国学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154页。

④ 官、吏分途的本质在于其身份的差异，虽然汉代官、吏身份的分别并不明显，但是，汉代官、民爵的分赐和由秩级高下决定的“长吏”与“少吏”之分，开启了魏晋以后官、吏身份有别，乃至界限分明的进程。关于官、吏界限及吏胥身份的形成，参见祝总斌：《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材不材斋史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1—626页。

⑤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9页。

⑥ 参见[日]平中冬次：《中国古代の田租と税法—秦汉經濟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7年，第319—357页；[日]上田早苗：《貴族の官制の成立—清官の由來とその性格—》，《中國中世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19—121页；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457—458页；杨振红：《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结构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年第5期。

⑦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3页。

⑧ 值得说明的是，汉代的官、吏分途主要是基于权益的分野，如汉惠帝赐官秩六百石以上“有罪当盗贼者，皆颂系”，“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班固：《汉书》卷二《惠帝纪》，第85—86页），汉景帝诏令，为官秩六百石以上配备相应的舆服、从者，以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9页），汉宣帝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4页），与魏晋以后官、吏分途还涉及仕进、贵贱、清浊、善恶等因素不同。官、吏分途在汉晋之际发生转型，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贵族制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展开分析。魏晋以后官、吏分途的发展，可参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⑨ 邹水杰：《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5页。

⑪ 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54页。

⑫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酷吏列传》，第3134页。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①秩百石以下为“少吏”，之上则为“长吏”，这一分界的意义主要是，分化了吏员群体。虽然此“长吏”“少吏”皆为“吏”，但是，秩百石以下的“少吏”主要从事杂务、厮役，具有浓烈的职役色彩，并供秩两百石以上“长吏”直接驱使。这些“少吏”在东汉已被认为是贱役^②。此“长吏”、“少吏”之分，实则是在吏员群体中划分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少吏”成为吏役的承担者^③。《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县、邑、道令长职司下注引胡广云：“明帝诏书不得僇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④按《续汉书·舆服志下》称“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⑤，则“黄绶”即二百石以上，百石以下称为“小人吏”，亦即《百官公卿表》的少吏。黄绶品级虽低，但却与政府机构的长官同视为长吏，与百石以下的小人吏有严格的区别，明帝诏书不准僇辱（指鞭笞等刑辱）黄绶，意味着百石以下的小人吏是可以僇辱的^⑥。

秩二百石与百石之间也逐渐成为秩制一个较为稳定的分界。如秩百石以下的属吏可以自行辟除，无需上报中央。《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⑦又如，从官秩月俸、印绶等级制度来看，秩百石以下等级明显降低。如月俸，《续汉书·百官志》云：“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⑧秩百石俸较秩比二百石俸竟相差 11 斛，远大于吏员群体中其他上、下秩级的差别。又如印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秩比二百石以上皆有印绶^⑨，《汉旧仪》云：“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⑩秩百石以下，按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身无半通青纶之命”^⑪，其印绶为“半通青纶”^⑫。《续汉书·舆服志》载：“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一采）长丈五尺，六十首”，“百石青（纶）[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⑬，与秩二百石以上的绶带相比，秩百石称“纶”而不称“绶”，称“宛转缪织”而不称“首”，其长度也明显缩短。据此，秩百石的“半通青纶”与秩二百石以上的印绶明显不同。《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胡广云：“明帝诏书不得僇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秩百石以下又称作“小人吏”。从明帝诏书来看，当时小人吏遭受僇辱应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后汉书·刘宽传》云：“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⑭又《后汉书·秦彭传》云：“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⑮不辱吏的行为反倒作为一种德

①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42 页。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唐长孺文集》第 6 卷《山居丛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33—137 页。

③ 祝总斌先生指出：吏胥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准、遵照官员命令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而不是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见祝总斌《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材不材斋史学论丛》，第 638 页。叶炜据此进行总结，认为中国古代的胥吏问题，涉及官与吏、吏与役两个方面，这与胥吏内部存在上下两个层次相关，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第 1 页。

④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五》，第 3623 页。

⑤ 司马彪：《续汉书》卷三十《舆服志下》，第 3675 页。

⑥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唐长孺文集》第 6 卷《山居丛稿续编》，第 135 页。

⑦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四《百官志一》，第 3558—3559 页。

⑧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五》，第 3632—3633 页。《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李贤注引《续汉志》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秩比二百石与百石的月俸差，是这些低秩级中最大的。

⑨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24—743 页。

⑩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93 页。

⑪ 范曄：《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 1651 页。

⑫ 汪桂海指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为严格百官印的等级划分，对官印制度作了改革，其中规定吏员印为方寸印，即通官印，官署印大小为通官印之半，名半通印，又名小官印。秩二百石以上长吏用通官印，而百石以下的少吏则用官署中的半通印。见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⑬ 司马彪：《续汉书》卷三十《舆服志下》，第 3675 页。

⑭ 范曄：《后汉书》卷二十五《刘宽传》，第 887 页。

⑮ 范曄：《后汉书》卷七十六《酷吏列传·秦彭传》，第 2467 页。



行记录下来。

秩二百石与百石之间成为了“长吏”、“少吏”的分界,实则是“吏”与“役”的分野。两汉时期,官、爵日益疏离,“爵一秩体制”下,作为帝国管理官吏的手段,秩制比爵制更为重要。六百石以下吏员也是民爵所赐予的对象,但民爵仅仅依靠赐予即可得来,随着民爵赐予的频繁,民爵所带有的权益日渐减少,渐趋于无用。这时,对于这些低级吏员而言,秩级所具有的权力、薪俸等,比起虚衔爵位更具实际意义。因是之故,随着民爵的轻滥,公乘以下爵级所具有的等级意义逐渐丧失,乃至不再使用。于是,对于秩六百石以下的吏员而言,秩级就成为了衡量身份高低的基本尺度。秩百石以下为“少吏”,虽然仍在帝国官吏体制之内,但是,常年供长吏差遣,逐渐被视作吏役,如《后汉书·冯良传》:“(冯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①《后汉书·陈寔传》:“(陈寔)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②《后汉书·赵晔传》:“(赵晔)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③这些小吏同编户民一样,都是地方长吏统治的对象,都是役的承担者。而在走马楼吴简中,编户民所任的“给吏”与官府中的“吏”在身份、地位、权益方面差别并不明显,甚至嘉禾四年(235)小武陵乡征赋户籍簿中标注了“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的吉阳里吏民,在下伍丘田家菑中径直写作“州吏”、“郡吏”、“县吏”^④,不再严格区分“给吏”与“吏”,表明在事实上编户民“给吏”与“吏”已基本趋同。所谓“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此“吏民”之“吏”主要指的是承担吏役的“少吏”,与服役的编户民并无多少区别。

至此,汉代官吏集团依秩级就出现了两分界。汉初官、吏民爵的分赐,以六百石为界标,划分“官”与“吏”。随着民爵的轻滥,实际行政中的主事与差遣关系,促使吏又以秩二百石与百石为界,划分“长吏”(吏)与“少吏”(役)。只不过,与魏晋以后相关情况相比,这些层次的划分尚无贵贱、清浊、善恶之别,“官”“吏”之别也没有后世那么明显。比如,从整体上来看,秩二百石以上至万石的“长吏”,虽然上下秩级间存在管辖关系,但是,他们都是机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上下秩级之间的贵贱区分不大,官职亦无清浊之别,而其下又皆有小吏可供差遣。从这个角度看,有学者仍将这些“长吏”视为“官”^⑤。只是,秩制的发展,官、民爵的分赐等,导致秩六百石成为该群体更为显著的分野。因这一分野而形成的上、下秩级之间,其身份的分别尚不明显,与魏晋以后的官、吏分途不可同日而语^⑥。而秩百石以下的“少吏”原本处于官吏的最底层,承担官府具体的劳务,与编户民服役并无多大的区别,吏逐渐混于平民之中,而合称为“吏民”。随着事役的繁复,民众视服役为畏途,逐渐形成的“吏户”、“士家”,其地位甚至在普通编户民之下。这些都是汉代官、吏、役分途在魏晋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 语

正如沈约所云:“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

①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三《冯良传》,第1743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陈寔传》,第2065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赵晔传》,第2575页。

④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吴简研究》第3辑,第17—18页。

⑤ 卜宪群先生认为:“从秦汉实际看,以官秩二百石作为划分官与吏的标准较确切。”参见氏著《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6—288页。杨振红先生认为:“曹魏制定九品官人法,将二百石以上划分为官,百石以下划归吏,以及孙吴时也将二百石以上之署长、佐官划归官,掾史等属吏划为吏,就是基于汉代关于“士”与“庶民”的观念与制度。”参见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群体内部,长官与属吏之间形成的“君臣之分”(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人臣称人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91页;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7页)、“君臣观念”(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7—218页),蕴含了魏晋以后另具特色的官、吏分途的因子。



有辨。”^①秦汉社会分层并非以“贵贱”为主要标准,也未出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②。秦汉之际文献中经见的“士大夫”一词,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士人官僚”不同,指的是士、大夫级爵群体,显示出强烈的军功爵制色彩,其参差爵级所体现的是军功大小、才能高低、贡献多少。秦汉之际,帝国正是以才用、功劳为依据,以爵制为基准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社会,正所谓“用成等级”是也。

秦汉时期,从“爵尊于官”向“重官而不重爵”发展^③。赐爵制的推行,民爵的轻滥,直接导致编户民身份由参差而等齐。而秩级的分界,以及由此形成的官、民爵之分和官、吏、役的分层,随之深刻地影响了汉帝国的统治秩序。汉帝国逐渐放弃了爵级维度,而以职、役为手段,塑造社会新秩序。原来皇权下的臣民,皆可称之为“吏民”,随着官、吏、役的分化,承担吏役的小吏,同编户民一样,皆是官府使役的对象,“吏”“民”因役而同质化。

还值得一提的是,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从“士大夫”向“吏民”变迁的过程中,“士民”不仅发挥着承接作用,还开启了“士庶”悬隔的进程。周秦社会变革,促使“士”由成年男子一义,衍生出诸多不同的涵义,既关涉身份等级,又蕴含学艺才智因素^④。

一方面,秦军功爵制的推行,使编户民通过军功不难获得士级爵,从而成为“士”。这些“士”实际上也是指低级爵的拥有者,他们出入编户民,“士”与“民”身份并无区别。秦汉之际,“士民”与“士大夫”实际上都指帝国统治的基础编户民。随着民爵的推行,“士大夫”阶层分化,汉魏文献中,更多的是使用“士民”来指代帝国基础阶层,“士”指的是士卒、吏士,如蜀汉归降曹魏呈送的“士民簿”,其内容主要是将士吏民户口统计^⑤。此“士民簿”与走马楼吴简“吏民簿”的性质、内容基本相同,“士民”即“吏民”,皆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总的说来,秦汉之际的“士大夫”、魏晋时期的“吏民”,以及这段时期中的“士民”,指的都是帝国的统治基础——编户齐民。编户民身份称谓的歧异,反映了帝国统治制度的变动对基层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秦汉时期,“士”不仅指成年男子、兵士、士级爵,其文士、智识、贤能、身份等级的色彩也日益浓厚。随着汉晋帝国官僚儒、吏分途,文、武分离,贵、贱分隔,清、浊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士”、“士大夫”逐渐多用来指代“知识官僚”,“士民”一词逐渐向我们所熟知的“士庶”演进。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贵族制的发展,“士民”,即“士人”与“庶民”之间,逐渐形成了“士庶之科,较然有辨”^⑥。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2页。

② 沈约:《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18页。“士庶”之“庶”起初多泛指普通民众,如《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听受吏民士庶上书”(第115页)。东晋以后,这一用法史籍中仍多见,如《宋书》卷八十一《顾凯之传》“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第2081页)。后来,“士庶”逐渐专指士族与庶族(寒门、汉族),所谓“士庶之科、士庶之际”,即士族与庶族之别。不过,此“士庶之科”,是士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③ 参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之“赐爵制与官僚制”,第150—170页;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之“爵禄与吏禄”,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5—128页。

④ 参见阎步克:《“士”形义源流衍变说略》,《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8—197页。

⑤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第901页。

⑥ 关于士庶之别的演进过程,可参见[日]葭森健介:《“士庶”考——针对唐宋变革前史的一个考察》,《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第116—159页。